

自序

《我的思想》自序



一九九〇年，劉再復在芝加哥大學東亞系宿舍。



柳鳴九先生主編「當代思想者自述叢書」，邀約我加入。答應之後，我才發現「自述」的條件並不成熟。因為通常「自述史」，總是迴避不了「生平史」，尤其是生平史中的關鍵性事件，例如我就迴避不了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那個舉世皆知的事件。在那個大事件中，我經歷過回國（從美國回到中國）、參與（儘管是被動參與）、逃離（經香港又逃亡到美國）、漂泊（到過四十多個國家）、反思。這段經歷，涉及很具體的歷史場景、歷史人物和自身的許多感受，甚至涉及今天我對那個事件的理性評價。

本書構思中，曾叩問過「自傳」是按主題分野形式分別寫出，還是按傳統的寫法編年自敘更好。想了想，覺得各有長處，試試吧，反正寫作就是試驗，不妨再試驗一次。於是，我就把「自述史」分解為「拚搏史」、「思想史」、「心靈史」、「錯誤史」、「寫作史」等五種，統稱為「五史自傳」。先完成「寫作史」以還債。其他各史留待以後再說。

不管怎麼寫，還是寫作態度最為重要。好在早已確定寫作應以說真話為本，真話雖然並非就是真理，但它卻是通向真理的前提。以往「說真話」是做人常識，現在則需要有些勇氣；「正直」本來是人的常態，現在則需要修煉才能抵達。這是時代的進步還是退步？當然是退步。寫作時，才明白對政府說真話難，而對朋友說真話也很難，甚至對自己的學生和子弟說真話也難。最後，覺得對自己說真話也不容易。在大時代的潮流中，自己固然當過「弄潮兒」，但也當過「隨波逐流者」；既當過「時代的先鋒」，也當過「時代的尾巴」；既有「知識」，也很「無知」。因此，「自傳」除了應當面對「主體的飛揚」之外，還應當面對「主體的黑暗」。也就是說，自己要對自己說真話，就必須戰勝自己的面子、自己的幼稚、自己的虛榮、自己的性格弱點等，所以也不是容易的事。

這部自述史，雖寫於美國，但全靠身在中國的表弟葉鴻基先生為我錄下文稿。因此，除了要感謝香港三聯負責人侯明兄、特約編輯王綱先生、



責任編輯張艷玲小姐外（沒有他們的鼓勵和支持，此稿不可能單獨問世），還要感謝葉鴻基表弟。

二〇一六年秋天，香港清水灣

人是不會思想的石頭

——思想史展開之前關於人的定義



壹
史前史
——沒有思想的年代

(二) 我的石頭記(上)

回顧自己的人生，我最滿意的一點是，自己從沒有思想(石頭)變成有思想(人)，又從思想不能獨立變成思想可以獨立，最後成為一個思想者。此時居然還可以撰寫「思想史」。我生活的時代是沒有思想的時代，我生活的中國是只許領袖一個人思想、不許千千萬萬百姓思想的中國。一九九五年，我到台灣參加《聯合報》舉辦的「四十年來的中國文學」研討會，在閉幕式上我發表了《讓思想者思想》的講話，講完後台灣大學齊邦媛教授拉着我的手說，你的內心口號也是我們大家的共同心願。齊教授那時已發表《二度漂流文學》一文表彰我，但尚未寫出代表作《巨流河》。

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有一句名言：「人是會思想的蘆葦。」後來，這句話成了關於「人」的經典表述。人是蘆葦，即人是很普通也很脆弱的生物，但因為人會思想，所以人便成為「萬物之靈長」，顯得聰明、高貴、非凡、神奇，富有尊嚴與驕傲。人之外的其他一切生物，無論是植物還是動物，都不會思想，再霸



氣的獅虎鷹鷲也不會思想。帕斯卡爾對「人」的表述之所以顛撲不破，就因為他抓住了「會思想」這一關鍵點。

我從小就熱愛思想，嚮往思想，把做一個「思想者」當作自己的夢想。於是，我讀書，主要是讀思想；寫書，也主要是寫思想。我說過，每寫一篇文章，都應當有所悟。所謂「悟」，也就是思想。可是，上帝卻把我拋進「不許思想」的中國和「沒有思想」的時代。於是，我的第一人生前期便只是一塊「石頭」的經歷。

我經歷了很長的「不許思想」的歲月，大約從童年時代一直延伸到七十年代末的中年時代。整個少年時代與青年時代，我努力讀書，但只能欣賞先人和他人的思想，不能表述自己的思想。我稱這個漫長的不許思想與不能思想的年代為「石頭」年代。在這個年代裏，我不是「人」，不是會思想的蘆葦，而是不會思想的「石頭」，類似被女媧拋棄的多餘的「蠢物」(《紅樓夢》語)。只是物，不是人。那段人生，正是我的「石頭記」。中國的兩部偉大文學經典《紅樓夢》與《西遊記》都是「石頭記」。兩部小說的主角原來都是石頭。充當石頭時，他

們只能「自歎自艾」（《紅樓夢》語），然而後來他們（賈寶玉和孫悟空）都通靈了。所謂「通靈」，便是有了思想。也可以說，是自然的人化、靈化、思想化。

上世紀一段漫長的歲月，所有的青少年，所有的中國人都被當作石頭。青少年的父母、爺爺、奶奶們，也是石頭。石頭只是材料，只是工具，黨指向哪裏，石頭就被扔到哪裏。我們整整一代人，其命運無法與孫悟空、賈寶玉相比。首先，他們通靈了，而我們遲遲未能「通靈」。其次，他們通靈之後，一個可以實踐「積極自由」，即向玉皇大帝、龍王、閻王討索自由；一個可以實踐「消極自由」，即迴避科舉，迴避人間老套。我們卻只是石頭，有機體時，石頭是「螺絲釘」；無機體時，石頭什麼也不是，連磚頭、斧頭、榔頭都不如。

石頭也受教育，也上幼兒園、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然而，所受的教育只是教化、奴化、馴化這「三化」教育。教育的結果便是更聽話，更馴服，更像供任意使喚的奴才。我在「三化」的陰影下，幸而遇到一所特殊的學校，可以自己瘋狂地閱讀，瘋狂地吸收。我是一塊很幸運的石頭。


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，中國的石頭們贏得一個「通靈」的歷史時機。那是鄧小平、胡耀邦等共產黨內的改革家，帶頭擺脫「蠢物」的蠢行，結束了一個悟性窒息的時代，開闢了一個讓靈氣飛揚的時代。石頭可以通靈了！一旦通靈，我便開始思想，並有了一部自己的「思想史」。以「反思」舊時代為發端，我打開「思想史」的第一頁，挑戰蘇式教條，挑戰中式教條，一九八九年之後又挑戰西式教條。我的挑戰，乃是因為石頭通靈，頭腦產生思想，內心的鋒芒要求突破各種教條框框，從泛馬克思主義到自由主義，甚至對於老式人道主義，我也質疑。人們說我是極左路線的天敵，我卻認定自己是所有教條老套的天敵。我的「千鈞棒」，不打妖魔，專打來自各方的教條。在國內如此，在國外也是如此。棒打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」，不是打擊現實主義，而是打擊多種號稱「主義」的政治意識形態；棒打「現代性」等等，也是為了打擊橫行於西方的新教條。

講起我的「思想史」，人們一定會認為我從唯物論走向唯心論。其實，「唯物」、「唯心」是石頭時代的簡單劃分。自從展開第二人生之後，我接受的不是不

二法門，無論是唯心論還是唯物論，無論是頓悟還是漸悟，無論是有神論還是無神論，無論是硬道理還是軟道理，我都以自身主體的感受為尺度，並不褒此抑彼。孔子也罷，莊子也罷，韓非子也罷，我都吸收其精華，拋棄其糟粕，處處以真理為重，絕不把自己賣給某一黨，某一派，某一家，某一姓，某一論。這一切，都是因為自己悟到，唯有獨立不移地面對多種思潮，多種知識，才是「金光大道」。沒有獨立，哪有思想？沒有選擇，哪有存在？沒有質疑，哪有學問？時代變了，質疑產生了，石頭「通靈」了——這便是我的「石頭記」。

回顧我的「石頭記」，可以知道，「通靈」（有思想）是關鍵。未通靈的石頭是「蠢物」，是「東西」，是垃圾。一旦通靈（有了思想），石頭便可走進高樓大廈。不僅可以成為人間大建築的一部分，而且可以成為賈寶玉、孫悟空似的生命，可以領略人間的悲喜歌哭，也可以大鬧天宮的蟠桃盛宴。有思想，人便成為人，贏得尊嚴與驕傲，光榮與永恆。

石頭通靈，石頭思想，這是石頭的人化。那麼，如何通靈呢？關鍵點移到



這裏了。二〇一五年，我在香港公開大學與莫言對話時，學院主持人讓我先講講莫言成功的原因，這也就是石頭如何通靈的問題。我講了三個原因：一是書本的濯澆；二是大地的滋養；三是個人的氣魄（鯨魚氣魄）。我講莫言，也是在講自己的經驗，關於石頭開化、人化、靈化、思想化的經驗。

據我的經驗，在一個「不許思想」的國度裏，靈化要成為可能，當然首先還是離不開閱讀，也就是「書本的濯澆」。見到任何書本都如飢似渴，拚命吸收。莫言說，他從兒時開始，就像小狗一樣，提着鼻子到處嗅着家鄉哪家有啥書味，然後借閱，瘋讀，吞嚥，吃盡村中所有的藏書。但書本的濯澆還不夠。書本還不足以點化石頭。書本之外還需要「大地」的滋養。大地對作家的薰陶有兩種：一是用它的「山光水色」滋養其審美的眼睛和音樂的耳朵；二是（更為重要的）用它的苦難對石頭進行「磨洗」，包括風化、火化等過程。大地對莫言這塊石頭進行開化的手段是「飢餓」。我也曾飽受飢餓的煎熬，知道飢餓對於石頭的通靈開化，何等重要。飢餓，使我明白民間的疾苦，人生的艱辛，世道

的冷暖，還讓我長出耐力與毅力。文化大革命這種大苦難，固然剝奪了我的許多時間，但也賦予我許多覺醒。正是文革對人的踐踏，才讓我學會了保衛人的尊嚴；正是文革對權利的剝奪，才讓我明白學者對於人的義務、責任和使命。文革對石頭既是摧殘，也是催生。它讓石頭開竅、開化，讓石頭在風裏滾、火裏燒，然後裂變、通靈、進化、言語，最後實現人化與思想化。我曾向朋友們訴說，牛棚對我的教育勝過十所大學；文革的風化與火化，讓我戰勝了課堂的馴化與奴化。文革的野蠻，使我這樣的乖孩子都覺醒了；燃燒的烈火，把我這樣的螺絲釘都熔化了。這正是大地的滋養，這種滋養是苦難的教育，死亡的體驗，浩劫的啟迪。它對於「思想」的產生，比書本的澤溉更有效。我本是一塊馴良的石頭，文革結束時，我便對文革進行「反思」，而這，正是「思想」的萌動。

（二）我的石頭記（下）

未通靈的石頭真可憐，主人把它拋到哪裏就是哪裏。一九七〇年夏天，我



被拋到河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「五七」幹校。

在我的人生歷史上，最難忘就是「五七」幹校的那段歲月。那是我一生最苦悶的時期，展示的正是可憐的「石頭記」。

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幹校在河南息縣，那是淮河氾濫波及的地方，也是河南最窮苦的地方。淮河吞沒了一切，只留下貧窮。那種窮，不是一般的窮，而是奇窮。房屋是草芥編造的，床鋪是泥土疙瘩壘成的，桌子、椅子等家具都是蘆葦桿編製的，連水缸也是蘆葦桿編織成形後，再抹上一層泥巴晾乾而成。然而，這種泥土做的水缸，裝的水竟然還是那麼清澈，真想不到！這也算是開了眼界。最慘的是有時還得下放參加整黨，已經在窮鄉僻壤了，還要下放到更窮的山村。在那種村子裏，吃的完全是豬食，睡的完全是狗窩。那個時候，我老是想起蘇格拉底的那個哲學概念——「豬的城邦」。

食住與豬狗差不多，這還不算，更慘的是還要起早摸黑，清查莫須有的「五一六」反革命集團。被清查的人，不僅是石頭，而且是低級石頭。誰都可以

敲他幾下，踩他幾腳。哲學社會科學部因為王力、關鋒、戚本禹曾經插手，所以被定為「重災區」，以遲群為首的工宣隊、軍宣隊在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獲得名聲之後，把隊伍開進這個重災區。那時，我寄寓的《新建設》編輯部被安排在學部機關第一連隊，我是一連四排三班的班長。不是「五一六」運動的清查對象，倒是清查別人的小走卒似的骨幹。說是骨幹，也是石頭，只是比低級石頭高級一點的石頭，可以免受蹂躪，但不能有思想。

「五七」幹校在息縣混過一年之後，全校搬到明港市。那裏除了有些現成的早已廢棄的軍營外，其他宿舍要「自力更生」。於是，我們便自己動手建築起燒磚廠，土坯廠，邊割麥子，邊脫土坯，邊燒磚頭，我幹得很累，中午一個小時的午休時間，常不顧一切地躺在麥田邊角的草堆裏，連「四腳蛇」（學名蜥蜴）在身上蠢蠢爬動，也懶得去理會牠們，實在沒有力氣再驅趕這些醜陋但沒有毒液的小爬蟲。在艱難的生活中，有一則消息，使大家開心了一陣，也讓我至今難忘。那是我們的連長去參加一個貧下中農座談會之後所作的如實傳達。他



說，貧下中農很坦率，他們在座談會上竟說：感謝你們這些中央派來的幹部，你們給我們帶來兩樣寶貝，一樣是毛主席著作，一樣是大便。你們拉的大便對我們太有用了，我們就缺肥料，有了大便糧食就能豐收，明年就不愁過日子了。連長說，這些貧下中農，怎麼可以把紅寶書與大便相提並論？！我聽完，心裏卻湧起一陣「向貧下中農學習」的口號。他們多老實呵，有啥說啥，決不拐彎抹角，這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優秀品格！

時時看到蘆葦，時時觸摸蘆葦編織的桌子、椅子及各種用具，於是，就想起了帕斯卡爾的那句名言：「人是會思想的蘆葦。」蘆葦很輕，很脆弱，根本無足輕重。把人比喻成蘆葦，很恰當。但帕斯卡爾又說是「會思想」的蘆葦，即會思想的生命。可是，那時我們哪有思想？不用說毛主席指示怎麼做，我們就怎麼做，即使是軍宣隊，他們指示怎麼做，我們也得怎麼做。軍宣隊說，哲學社會科學部共一千八百人，被懷疑是「五一六」分子的對象已達一千人。還說我們這些審查「五一六」分子的排長、班長裏也有可疑對象。在軍宣隊眼裏，早已草